

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

中国蒙古史学会编

(19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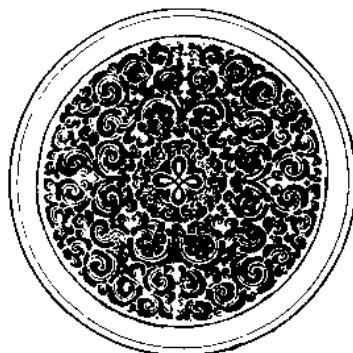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

中国蒙古史学会编

(一九八三)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七·呼和浩特

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3）
zhōng`guó mēng gǔ shí xué huì lùn wén xuǎn jí

中国蒙古史学会编

*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发行 乌海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4.375 字数：600千 括页：3

1987年9月第一次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910册

统一书号：7100·401 定价：5.00元
108892

责任编辑：王挺栋

封面设计：刘嵩柏

中国蒙古史学会1983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全体代表合影（昆明）



中国蒙古史学会第十四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
一九八三·九·十六·于昆明

编　　者　　的　　话

《中国蒙古史学会第四届年会论文选集》是由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的蒙古史、元史的研究、教学工作者，提交一九八三年八月在昆明召开的中国蒙古史学会第四届年会暨学术讨论的六十余篇论文中，经过筛选的三十六篇收入本论文选集刊。

这个《论文选集》，是继中国蒙古史学会一九七九年在呼和浩特召开的第一届年会选编的《论文纪念集刊》；一九八〇年在海拉尔召开的第二届年会后选编的《论文选集》；以及一九八一年在乌鲁木齐召开的第三届年会后选编的《论文选集》之后的第四部蒙古史研究《论文选集》。通过这些《论文选集》中所发表的文章，大体上可以看出：从建国后的三十多年以来，特别是自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蒙古史研究专业队伍力量，不断得了发展壮大，随着他们的学术研究不断提高的过程中，研究工作的范围和选题，也逐渐向纵深发展。通过这些《论文选集》，基本上反映了近年来我国对蒙古史研究的概貌。

本学会历届年会的《论文选集》，除了注重发表资高望重的史学先辈和专家、学者提交年会的论文外，同时本着大力培植新苗、广采多纳的精神，占用较多篇幅来发表我国中、青年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更为可喜的是，在提交本届年会的学术论文中，有不少的文章突破以往蒙古史只局限于蒙、元时代的人物和重大政治事件研究范围，而富有开拓性的对明、清、近现代蒙古史的研究，以及对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性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和民族关系等方面的研究，都做出

了新的成果。从而对这些薄弱环节研究有了新的突破，这为本届年会的《论文选集》增添了一些新的色彩和新的特点。

收编在《选集》中的论文，以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对各类文章的观点，以文责自负的原则，不苛求统一；对各种学术问题的探讨、评论，仅代表作者的看法，不应视为是对某一问题的定论性意见。为尊重作者的文风，对各类题材的论述方法，不强求形式上的一致。为了论证和史实的准确，凡收入《论文选集》中的文章，除由作者进行修改订正外，本《选集》的编者亦作了些必要的文字和技术性的处理工作。

根据本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议的领导小组研究商定的意见，本《论文选集》的选编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高文德、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珠荣成、内蒙古大学特布信三同志，分别进行审阅初选工作，又交作者修改，最后由卢明辉、王挺栋二同志负责进行总纂，编辑、定稿。

在出版本《论文选集》工作中，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领导、责任编辑和校对工作者，均给予了大力支持，谨表谢意。

限于编审工作者的学力水平，本《论文选集》中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尚祈史学界前辈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批评。

编 者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于呼和浩特

目 录

编者的话

- 元代乃蛮是蒙古而非色目考 黄时鉴 (1)
从蒙金战争看成吉思汗的战略战术 朱清洋、李鹏贵 (6)
成吉思汗时期斡赤斤受封领地的
 时间和范围 白拉都格其 (18)
试论儒士在蒙古汗国中的作用 吴 涛 (22)
忽必烈以农为本的经济方法 赵富华 (30)
元朝中期蒙古族政治家拜住 匡裕彻 (42)
老沪洲城“刘整降元”石像考 陈世松 (50)
《元史·河渠志·济州河》辨析 陈有和 (56)
从王国维的蒙古史研究论王国维
 学述研究的基本特点 余大钧 (60)
《蒙古秘史》汉译考 甄 金 (73)
试论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之间及其与
 中原汉族的关系 卢明辉 (83)
蒙古名称及其族源的若干问题 叶幼泉、王慎荣 (97)
十三世纪蒙古与畏兀儿关系初探 樊保良 (116)
室韦的族源和各部方位 王 遥 (128)
有关奚族族源的两个问题 冯继钦 (139)
术不姑之初步研究 陈广耀 (146)

塞典赤治滇评述	方 铁	(156)
嘎仙洞北魏石刻祝文再考	刘昭棣	(172)
明代蒙古族婚姻和家庭的特点	杨绍猷	(179)
明代瓦剌与西域	马曼丽	(192)
关于文天祥和忽必烈的评价问题	赵永春	(200)
明代前期蒙古与女真关系述略	白翠琴	(208)
关于永谢布	薄音湖	(216)
土默特渊源别考	陶克涛	(221)
试述明朝对所辖蒙古人的政策	宝日吉根	(239)
略论明代洪武期间与北元的战和	张立凡	(248)
清代前期准噶尔与内地的贸易关系	蔡家艺	(255)
清初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两条交通线	袁森坡	(281)
论蒙藏封建主围绕真假六世达赖喇嘛 展开的争权斗争	蔡志纯	(291)
《康熙谕阿玉奇汗敕书》试析	马大正、郭蕴华	(300)
策妄阿拉布坦与沙皇俄国 ——博罗库尔干出使俄国、寇科夫斯基出使准噶尔与 达尔扎复又出使俄国评述	宋嗣喜	(306)
清朝政府对蒙古的宗教政策	康右铭	(314)
清朝统治蒙古经济政策的几个问题	赵云用	(325)
清代蒙古游牧经济浅议	邢亦尘	(336)
察哈尔蒙古的西迁	巴 赫	(347)
关于蒙古封建王公制度向民国延续问题	田志和	(354)
中国蒙古史学会第四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综述		(362)
中国蒙古史学会四年来的概况		(367)

参加中国蒙古史学会1981年年会

暨学术讨论会的报告……………（日）若松宽（371）

中国蒙古史学会第四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出席名单……………（378）

元代乃蛮是蒙古而非色目考

黄时鉴

元代有四个民族等级：蒙古、色目、汉人、南人。乃蛮属于色目，钱大昕、屠寄、柯劭忞以及日本籍内直诸氏都持此说，久已成为定论。然而，我想在本文中证明：元代乃蛮是蒙古而非色目。

迄今为止，认定乃蛮属于色目，主要依据如下四条材料：

A，《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氏族〉条，“色目三十一种”中列有“乃蛮歹”。

B，《元史》卷六《世祖纪》：“〔至元五年三月丁丑，〕罢诸路女直、契丹、汉人为达鲁花赤者，回回、畏兀、乃蛮、唐兀仍旧。”

C，《元史》卷八二《选举志二·铨法上》：“〔至元六年，〕以随路见任并各投下创差达鲁花赤内多女直、契丹、汉人，除回回、畏吾儿、乃蛮、唐兀同蒙古例许叙用，其余拟合革罢，曾历仕者，于管民官内叙用。”

D，《元典章》卷八《吏部·官制三·承荫·达鲁花赤弟男承荫》：“至元七年六月，尚书省准中书省咨，……权拟总管府达鲁花赤应合承荫之人，于下州达鲁花赤内叙用，散府诸州达鲁花赤应继之人，于县达鲁花赤内叙用，……除蒙古、回回、畏吾儿、乃蛮、唐兀等达鲁花赤应继之人，依准前项所拟闻奏，所据契丹、女直、汉儿达鲁花赤应继之人，拟同管民官体例承荫叙用。……”

我以为这些材料不足以定谳，理由下面再说。在这里，我先举出另外四条明示乃蛮属于蒙古的证据：

甲，《元史》列传的乃蛮人共有五个：抄思、月里麻里，囊加歹、铁连、和尚。这最后一个和尚，传在卷一三五，传文说他是“蒙古乃蛮人”。这同《元史》中有传的克烈人一样，在部名前面加上了“蒙古”两字：卷一二二的梁直膳鲁华，蒙古克烈氏；卷一二四的速哥，蒙古怯烈氏；卷一三四的也先不花，蒙古怯烈氏。克烈氏当也属蒙古，这是明证。不过，写明“蒙古乃蛮氏”的，《元史》中仅此一例，似有孤证之嫌。那末，再看下面三条。

乙，元明善《清河集》卷六《魏国忠懿公神道碑》记：章佩少监赫赫的祖母兀鲁阿迷失是“蒙古乃蛮氏”。这个说法同七条《元史·和尚传》中的文字是一致的，所以上条材料并非孤证。

丙，《元统元年进士录》载有那年（一三三三年）蒙古色目第一甲、第二甲、第三甲共五十名，其中蒙古二十五名，色目二十五名。在这榜上有名的五十人中，有两个乃蛮氏，

然而未写明是“蒙古乃蛮”。由于这份名单是蒙古色目混列的，全文脱字又较多，几乎不可能全部考出五十人的各个所属民族、部落。但是，我在初步考证以后，还可确认这两个乃蛮人属于蒙古之列。下面按《进士录》原文的次序列出这五十个人的名氏籍贯，除个别入未详外，我给分出民族等级（蒙古或色目），并作必要说明，□，原缺；□中有字，原缺今补。

- 1，同同，贯真定路录事司侍卫军广蒙古□□那歹氏。蒙古。
- 2，余□，贯庐州路录事司唐兀人氏。色目。
- 3，寿同□涯，贯绍兴路别失八里□先儿氏。色目。“先”当系“兀”之讹。
- 4，虎理翰，贯奉元弘吉得人氏。蒙古。
- 5，慕莫，贯大都路宛平县回回于阗人氏，见居杭州。色目。
- 6，大吉心，贯山东军户，见居真定路，哈儿鲁氏。色目。
- 7，亦速歹，贯蒙古札只刺歹人□□龙兴□□□司。蒙古。
- 8，野仙普化，贯右都威卫探马赤军□□□氏，居德州。蒙古(?)。按：右都威卫即隆福宫右都威使司，设于至元三十一年，原即成吉思汗时木华黎编立的五投下探马赤军，以五投下蒙古军为骨干组成。而钱大昕《元史氏族表》补作唐兀氏，不知有何根据。
- 9，买住，贯广平路唐兀人氏，见居成安县。色目。
- 10，敏安达尔，贯真定路灵寿县亦乞列思人氏。蒙古。
- 11，乌马儿，本贯阿里马里回回人氏，大名路□襄阳。色目
- 12，伯颜，贯成都路温江县籍管蒙古军户唐兀人氏。色目。
- 13，阿虎歹，贯大名路滑州内黄县左翼蒙古。蒙古。
- 14，穆古必立，贯大都鹰房总管府籍回回人氏。色目。
- 15，□□□失，贯河阳府景陵县忙兀台。蒙古。
- 16，丑闻，贯昔宝赤身役唐兀氏。色目。
- 17，别罗沙，贯西域别失八里人氏，居龙兴。色目。
- 18，□合谋沙，贯□□□□□□□氏，居常州录事司。色目。按：据此人之名，“蛮氏”前当脱“木速鲁”。木速鲁蛮，刘祁《北使记》作没速鲁蛮，耶律楚材《西游录》作谋速鲁蛮，《元史》、王恽《乌台笔补》作木速儿蛮，等等，即今译穆斯林，伊斯兰教徒，在元代列为色目。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一五《刺守》列一木速鲁蛮兀都马沙曾任镇江路总管兼管内劝农事。
- 19，朵列图，贯曹州济阴县乞失里台人氏。蒙古。
- 20，普达世理，贯别失八里畏兀儿氏，居岳州录事司。色目。
- 21，丑闻，贯河南淮北蒙古军户哈刺鲁氏。色目。
- 22，札刺里丁，贯嘉兴路崇德州。色目。
- 23，囊加歹，贯济南路济阳县察罕达达儿氏。色目。按：“察罕”，蒙古语“白”。元时，白达达指汪右部。汪古是色目。参见周清澍《汪古部事辑·汪古部的族源》。
- 24，明安达耳，贯左翼蒙古侍卫军户，居曹州，唐兀氏。色目。
- 25，安□刺，益都路滕州邹县唐兀氏。色目。按：元滕州隶于益都路。
- 26，□□□。〔缺文〕
- 27，阿都刺，贯中兴路录事司，昔里马回回人氏。色目。

- 28, 托本, 贯大名路濮阳县军籍, 哈利鲁人氏。色目。按: “利”当作“刺”。
- 29, 也先溥〔化〕, 贯平阳路大平县军户, 弘吉刺氏。蒙古。
- 30, □□, □□回回人氏, 居绍兴路新昌县。色目。按: 钱大昕《元史氏族表》补名“刺马丹”。
- 31, 脱颖, 贯南康路□□速鲁蛮氏。色目。按: “速”前脱“木”, 参见前第18人按文。
- 32, 买阔, 贯濮州蒙古军户斡罗台氏。蒙古。
- 33, 察级, 贯般阳路莱州掖县塔塔儿人氏。蒙古。
- 34, □□, 贯东昌路聊城县唐兀。色目。
- 35, 百嘉纳, 贯河南府洛阳县蒙古人氏。蒙古。
- 36, 道同, 贯别失里畏吾人氏, 见属池州路录事司。色目。
- 37, 阿台, 贯平路曲□县军籍, 乃蛮氏。蒙古。
- 38, 锢护伦, 贯临江路录事司寓居畏吾。色目。
- 39, 博颜达, 贯蒙古札刺儿人氏。大名路附籍, 见居江州。蒙古。
- 40, 博颜歹, 贯济宁路金乡县军户札刻儿人氏, 蒙古。按: “刻”系“刺”之讹。
- 41, 护都不花, 贯河南府居衡州路录事司军户。
- 42, 柏延乌台, 贯河南府路登封县军籍。
- 43, 月鲁不花, 贯南阳府郏县, 居绍兴路。逊都台氏。蒙古。按: 逊都台, 即《元朝秘史》中的速勒都思, 拉施都丁《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突厥蒙古部族志》作Suldus。列入迭儿列勤蒙古人。
- 44, 脱颖, 贯晋宁路高平县军户札刺儿氏。蒙古。
- 45, 野仙脱因, 贯河中府河东县军户蒙古氏。蒙古。
- 46, 廉□, □□□□畏吾儿氏。色目。
- 47, □□达, 贯建德路录事司燕只吉台氏, 蒙古。
- 48, 燕质杰, 贯陵州怯列歹氏。蒙古。
- 49, 寿同, 贯汴梁路开封县达鲁乃蛮氏。蒙古。按: 达鲁乃蛮即答禄乃蛮, 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八有《答禄乃蛮氏先茔碑》。
- 50, 明□, □□□□都督府军□□□氏。
- 上列五十人中, 可考定2、3、5、6、9、11、12、14、16、17、18、20、21、22、23、24、25、27、28、30、31、34、36、38、46为二十五个色目人, 因而其余二十五人无疑都是蒙古人。尽管这二十五个蒙古人中, 8无确证, 26缺文, 41、42、50缺考, 但我们仍可认定37□台和49寿同这两个乃蛮人只能属于蒙古。
- 这里附带说一下: 此文初稿写成后, 读到新加坡国立大学萧启庆博士寄赠的近作《元统元年进士录校注》(载台湾《食货》13·1、2合刊与3、4合刊, 1983年5月与7月), 我在修改时有所参考。萧氏的校注颇为详审, 使我对上述考证更不存疑。
- 丁, 《金石萃编末刻稿·元》卷下收有《□正庚□国子□□试□名记》。这是至正庚子年(一三六〇年)的进士题名记。《元史》卷四五《顺帝纪八》至正二十年正月卯乙条规定, 这年因为乡试所取举人只有八十八名(原额为三百名), 按三分取一的比例, 又添加一些, 一共才录取三十五名进士。据此《题名记》, 正榜蒙古共六名, 其中一名是“脱欢, 字企颜, 乃

蛮”；另一名是“必礼图，字善道，乃蛮”。同时，在正榜色目中有两人注明是畏兀，在副榜色目中有一人注明是唐兀。如果丙条材料需要考证一番才可用作证据的话，那末这丁条材料就一目了然了。

我想，上面甲乙丙丁四条材料足以证明乃蛮是蒙古了。尤其是丙条和丁条，那是科举殿试的正式记录，而我们知道在元代科举中四个民族等级是划得一清二楚的，在这里决不会出现含混或误列的差错。

自然，人们要问：既然乃蛮是蒙古，那末前面A、B、C、D四条材料又该如何解释。我们现在就再分析一下这四条材料。

先说A条。我们知道这《南村辍耕录》《氏族》条是研究元代民族等级的基本材料之一，但它也含有不少错误。这条材料在列举“蒙古七十二种”和“色目三十一种”时，有的重出，有的在蒙古、色目之间错置。这些，钱大昕、箭内亘诸氏早已有所指摘。例如，在三十一种色目中“火里刺”两出，而且“火里刺”是蒙古，被错列为色目了。“火里刺”即《史集·突厥蒙古部族志》中的豁罗刺思(Quarulas)，迭列列斤蒙古人，是从弘吉刺部分出来的。又如“秃八”，陶宗仪也列为色目，其实当属蒙古。“秃八”即“拓跋”，虞集《道园类稿》卷四五称之为“蒙古拓跋”。现在看来陶宗仪把“乃蛮歹”列为色目，同样是弄错了。箭内亘在《元代社会之三阶级》一文中疑《辍耕录》蒙古七十二种的“蛮歹”前脱一“乃”字，这样，“乃蛮歹”就既被列入蒙古又被列入色目了。这是很可能的。不过，箭内亘未察觉乃蛮不是色目，所以他以为列入蒙古的“〔乃〕蛮歹”是误列。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把乃蛮歹列入蒙古是对的，而列入色目却错了。

再说B、C、D三条。这三条材料确实并列了回回、畏吾、乃蛮、唐兀，但能否据以认定乃蛮就是色目呢？不能。这些是至元五年、六年、七年（一二六八、六九、七〇年）的记载。这个时候，不仅还没有南人，就连蒙古、色目、汉人这三个民族等级也还没有划分得很清楚。从成吉思汗起，大蒙古国的统治者就是区别对待诸民族、部落的：先归服的优于后归服的，主动归附的优于被征服的，游牧民族优于农耕民族。原来划为色目的回回、畏兀儿、唐兀等在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时期，地位是比较高的。然而四大民族等级的划分，是在忽必烈即位以后才逐渐形成的。在忽必烈即位前后，并没有后来那样的民族等级，而且汉人的地位还一度高于回回，在中统三年（一二六二年）李璮之变以后，忽必烈才开始削弱汉臣的权力，并开始又重用回回等既非蒙又非汉的其他民族部落的人。据《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年（一二六五年）二月“甲子，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这是限制汉人不能充达鲁花赤，但汉人的地位还不低于回回。三年以后，忽必烈又规定罢女直、契丹、汉人为达鲁花赤者，而蒙古、回回、畏兀、乃蛮、唐兀仍可充任，这就是B、C、D三条材料所记的史实。问题在于：至元五年、六年、七年时是否已经有了色目这个民族等级？单凭这三条材料是看不出来的。而且当时确还没有用色目这个词来明确区分一种民族等级。忽必烈虽在至元年间已开始在各方面对不同的民族部落给予不同待遇，但色目一词被用来指称一种民族等级，乃是较晚的事，大致上到了元成宗大德年间（一二九七—一三〇七）才开始。大德以前，公文中基本上以列举民族部落的格式来表示各民族部落诸地位待遇的差别，民族等级的划分还未十分确定。《元典章》卷十八《户部四·婚姻·婚礼》“嫁娶聘财体例”条第七款规定：“诸色人同类

自相婚姻者各从本俗法，逆相婚姻者以男为主。蒙古人不在此例。”这里的“诸色人”指的是蒙古人以外的各民族人，与后来“色目人”的含义显然不同。《元典章》卷三十《礼部·礼制·丧礼》“禁约焚尸”条载录的至元十五年的文件提到：“……除从军应役并远方客旅诸色目人许从本俗不须禁约外，据土著汉人拟合禁止。”这可能是现存最早使用色目一词的元代公文，但其含义还不是十分清楚的。~~大德以后，民族等级的划分才实际上确定下来。~~《元史·成宗纪》：大德元年四月“丙申，中书省御史台臣言：‘……各道廉访司必择蒙古人为使，或阙，则以色目世臣子孙为之，其次参以色目、汉人。’……制曰‘可’。”这是最早明确记载。值得注意的是，到了这个民族等级划分确定下来的时候，乃蛮就不再同列于色目的诸民族部落并提了，而是被划为蒙古的一部分了。甲乙丙丁四条材料全出自大德以后，正好是同这个历史情况相符合的。所以，B、C、D三条材料所记的虽然也是史实，但却不能成为乃蛮是色目的根据。

据以上对有关史料的发掘和辨析，我以为可以确认元代乃蛮是蒙古而非色目。

辨明乃蛮是蒙古而非色目，有助于我们研究蒙古民族的形成。亦邻真在《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一文中说：“辽金时期蒙古高原各部是形成蒙古民族的基本成员。”“蒙古国建立后，用新的千户制体系分封人口。战败的部落，如塔塔儿、克烈、乃蛮被瓜分到各千户。原有的部落界线进一步打乱了。这正是蒙古民族形成的开始。”我同意这个结论。但如果乃蛮是色目，那末这个结论就显得颇为勉强，因为在蒙古兴起时乃蛮占了蒙古高原大片地方。现在我们清楚了：实际上乃蛮在元代已被列为蒙古，它确是形成蒙古民族的基本成员之一。这个事实也表明：原来在语言上属于突厥语族的乃蛮部在元代已经蒙古化了。

辨明乃蛮是蒙古而非色目，也有助于我们对元代民族等级制度的了解。乃蛮划入蒙古显然是因为它在大蒙古国成立以前就已经被征服了。看来除了民族区分本身以外，归服的先后是元朝统治者划分民族等级的首要因素。从这一点我们就好理解为什么四川人被划入汉人等级，因为四川虽原是南宋统治的地域，但在元灭南宋以前它的大部分地方已先被蒙元征服了。此外，契丹、女真被一分为二，过游牧生活、不会讲汉语的契丹、女真比同色目，过农耕生活、汉化的契丹、女真比同广义的汉人，这是看重了两者之间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但实际上也同归服的先后有联系。前一种契丹、女真生活在邻近蒙古的草原，他们归服蒙古也要早一些，所以他们的民族等级也高一些。

从蒙金战争看成吉思汗的战略战术

朱清泽 李鹏贵

引 言

史书称颂成吉思汗“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①。这其中虽有某些溢美的成份，但却是对成吉思汗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的概括。成吉思汗后半生，特别在蒙金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雄才大略尤为突出、鲜明。他的战略战术，与统一漠北战争时相比，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因为实践出真知，辽阔而复杂的蒙金战场，为成吉思汗导演出一幕幕精彩动人的活剧，提供了极好的舞台。这时的作战对象、战争范围、战区地理条件及作战手段等等都起了极大的变化。统一战争时的作战对象札答兰部、克烈部、乃蛮部以及塔塔儿部等，都是互不统属的大小游牧部落，而攻金战争时则面对女真贵族统治的、以汉族为主体的、物产丰富、文化发达的上邦大国。它虽然已进入衰朽阶段，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战争范围，原来主要在漠北地区，而攻金战争时则扩大到东至海，西到西夏，北起大漠，南到汉水、淮河流域。战区的地理条件，原来是便于骏马驰骋的蒙古高原，而攻金战争时则既有江河沟渠障碍，又有城堡险关。在作战手段上，由野战为主转为攻城夺塞为主，因而，单靠高超的骑术和熟练的箭术已经远远不适应战争的需要了。上述变化了的情况，要求成吉思汗及其统帅的蒙古军，在战略战术上必须随之作出相应的巨大转变。成吉思汗及其麾下将领们的高明之处，正是在于他们在作战中不因袭成规旧法，不单纯局限于骑兵驰突，而是善于临敌应变，料敌用兵，因人而施，因时造势，充分发挥了蒙古骑兵的特长和新兴民族的锐气。因此，如果说成吉思汗的战略战术在统一战争时还处于初级阶段，那么，到蒙金战争时则已经发展到了高级阶段。本文试以蒙金战争的二十四年进程为背景，对成吉思汗的战略战术作一初步探讨。

战前的诸方面准备

成吉思汗亲自率军进攻金国，始于1211年（金大安三年、蒙古太祖六年）^②。但攻金的战争准备工作，早在统一蒙古诸部后的1206年就已着手了。在很早以前，成吉思汗的祖宗俺

①《元史·太祖纪》25页。

②《元史·太祖纪》15页。

巴孩被金国钉死在木驴上，蒙、金结下了世仇。^①在金世宗时，金人又每三年出兵对蒙古实行一次“减丁”，致使蒙古民众对金统治者“怨入骨髓”^②，因此，成吉思汗早想利用蒙古民众的仇金情绪，发动攻金战争。但当时蒙古高原上他的仇敌太多，无力伐金。当他于1206年立国称汗以后，自觉力量充实势力日盛，便“定议致讨”。^③富于作战经验的成吉思汗深知，要打败金国这样一个上邦大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远隔广漠，对敌情若明若暗，特别是对金国的界壕边堡闻而生畏，所以“未敢轻动也”。^④于是，他除了扫除内部残余反抗势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蒙古诸部的统一、安定后方、建设基地之外，积极而又隐密地进行了大量、直接的攻金战争准备工作。主要有五个方面：

1、**积极整军备战。**成吉思汗从立国之日起，便根据蒙古民族的特点，建立了军政一体的统治机构，以十进法编练所属及收降之部族，任命九十五个千户分管。^⑤战时，则按千户征派徭役和签调军队，形成丁平战结合的武装力量组织体制。他规定凡十五岁到七十岁的男子，都列入军籍，自备战马，随时准备出征。抓紧造箭制盾，秣马厉兵。规定每个战士随身携带的武器有：革制甲、兜、小帐、革囊、锅、弓、斧、刀、矛各一。凡出师，人有数马，轮番骑用，远程驰骋，马力不衰，“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⑥他还强调，“军队的糇粮须取资于敌人。”^⑦因此，其军队在征战中不需后勤，行动敏捷自如，疾如飙至，劲如山压，“来如天坠，去如电逝”。^⑧世人曾认为：当时，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军队能与蒙古骑兵相匹敌。^⑨为提高战力，成吉思汗迅速扩充精锐部队，仅怯薛（护卫）军就由五百余名扩充至万骑，后又以此为中坚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蒙古军。大将有“四杰”：博尔求、博尔忽、木华黎，赤老温；先锋有“四狗”：忽必来、者勒篾、哲别、速不台。^⑩蒙古军纪律森严，强调绝对服从，对不从命或临阵逃跑者，皆处死刑。他还把战功大小与分得财物多寡联系在一起，以此来提高士气。同时，成吉思汗还大量罗致贤才，弃嫌仇，任智勇，使这支长于野战和远征的蒙古军，成了攻金的精锐之师，

2、**利用各种渠道刺探金国的情报。**成吉思汗深知反以知彼，复以知己的重要性，多年来养成了“察敌情伪，专务乘乱”^⑪的良好习惯。他利用往来于蒙、金之间的官员、使节、商人和居于阴山北部为金守边的汪古部人以及金国的降人等等渠道，广泛收集金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及地理情报。例如早在克烈部王军被消灭以前，成吉思汗就曾直接同金国派往王罕的使节耶律阿海作过面谈。耶律阿海见成吉思汗举止非凡，有意投附，就说：“金国不治戎备，俗日侈肆，亡可立待。”^⑫成吉思汗得到这个深知金国内情的人，非常高兴，就把耶律阿海留在身边，让其“参予机谋，出入战阵，常在左右”^⑬。到乃蛮等部被削平以后，成吉

①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1分册169页，余大钧、周建奇译本。

②《蒙古秘史》10页，《王因维遗书》上海古书店出版。

③、④《元史·太祖纪》13页。⑤道潤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222页

⑥《元史·兵一》2508页。⑦《成吉思汗帝国史》76页，林近工译本。

⑧彭大雅《黑鞑事略》。⑨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32页，何高济译本。

⑩《元朝秘史》235页，李文田注，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⑪彭大雅《黑鞑事略》。

⑫、⑬《元史·耶律阿海传》3549页。